

大理白族自治州
南诏史研究学会

一九八六年论文、资料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一九八六年 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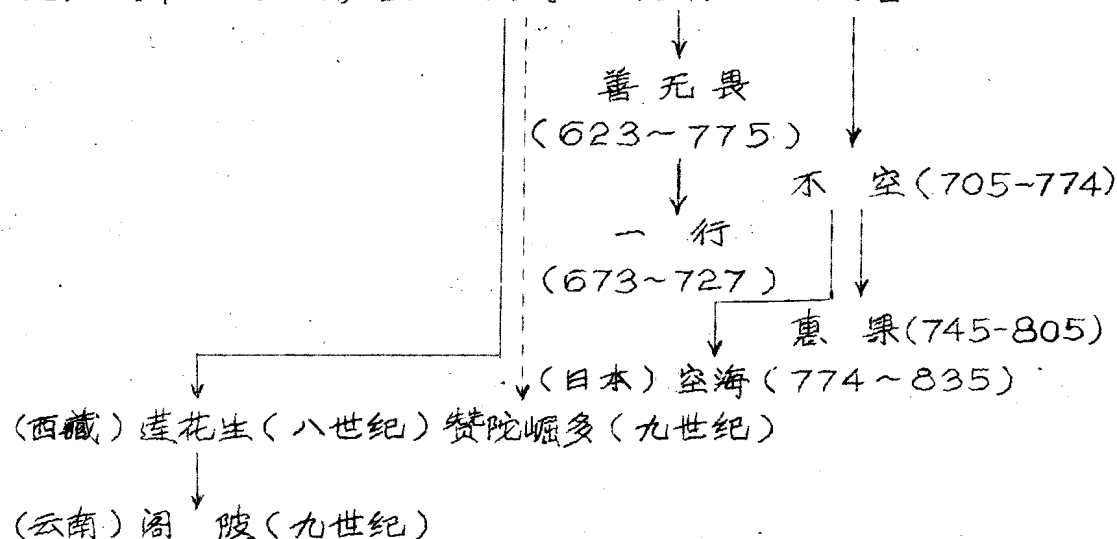
试论佛教密宗在云南的传播	张 楠	1
南诏蒙舍城遗址调查记	陈维鼎	8
洱海名称由来与历代演变释	杨延福	11
谈谈挖色坝的行政设置和地名变化	王 富	18
略谈白依(彝族支系)源流和习俗	张 穗	23
白族未必崇龙	张 了	32
两个本主庙考	杨 锐	37
南诏属地找允炆		
——明朝建文皇帝下落线索	刘绍昌	43
杜文秀起义中的白族将领	马绍雄	45
蛇骨塔测易方法——建立文物档案	聂成立、陈荣贵	51
“六科六解亚”	张绍曾	55
大理弘圣一塔修建年代探讨	马开文	60
大理古代回族史述略	王胞生	62
《白国因由》是云南少数民族		
的一部珍贵文献	吴 棠	75
大本曲曲本的白语汉字记录问题	尹明举	84
对“嵩、昆明”的探讨	林荫曾	93
弥渡首次发现新石器遗址	张 昭	98
弥渡第一块明代早期汉梵文两面碑概述	张 昭	99
剑川石钟山第七号窟王耆像新释	田怀清	102

试论佛教密宗在云南的传播

密宗，是大乘佛教派别之一，在印度称为“密教”，在中国叫做“密宗”，也叫做“真言宗”，因其传授佛法有身密、口密、意密的神密特点，故又称为“秘教”。据《中国佛教》一三密宗条所说：初期印度古密教传入，开始于三国时代，大乘经内参有密咒。随着大乘佛教的流行，密咒在中国传播。第二期是印度纯粹的瑜伽密教传入，也就是中国密宗正式建立时期。第三期为印度晚期密教输入时期。宋初，印度僧法天、天息灾、施护等先后到中国于公元982年在译经院译经。

密教传承的世序大体如下：

昆卢遮那 → 金刚萨埵 → 龙树 → 龙智 → 金刚智



密宗在中原只兴盛了一百多年就逐渐衰绝。密宗从长安，往沿海传入日本，称为“东密”；与此同时，密教又从印度传入西藏，称为“西密”。除东密、西密外，密教是否传入云南，形成别具特色的“南密”呢？本文试从现存的文物资料，对密教在云南的传播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学者指正！

佛教传入云南的路线，有中原、西藏、印度传入的诸说，但就传入的时间一般则认为始于南诏。我们要研究密宗在云南传播的时间和路线，要从南诏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制度谈起。

南诏，是唐代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奴隶王朝，其地理位

置正处在吐蕃（今西藏）和唐王朝两大势力之间。唐初，吐蕃势力扩大到西洱河（今大理），诸“蛮”相继降附。唐王朝为了平息吐蕃的扰乱，一方面支持“率种诚归、累代如此”的南诏（今崧山）；另一方面，使用武力进行征讨。公元707年，唐中宗派侍御使唐九征进行讨伐。据刘肃《大唐行记》记载：“时吐蕃以铁索桥跨漾水（今漾濞江）、濞水（今备顺河）为界，以通西洱河，筑城以镇之。九征尽刊其城堡，焚其二桥，命书记阎丘均勒石剑川，建铁柱于滇池（洱海之误），以记功焉。”唐王朝支持南诏王皮罗阁于公元738年前后，统一六诏，其目的是为了对抗吐蕃，经营云南，但是，统一后的南诏统治集团，又想趁机扩张自己的统治势力，因此，又同唐王朝发生矛盾，终于爆发了“天宝战争”。公元752年，南诏归附吐蕃，被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从这些记载，不难看出，吐蕃势力曾几度进入洱海地区，也就在这时，密教从西藏传入云南。据唐樊绰《蛮书》记载：“咸通四年（公元863年）正月初六日寅时，有一胡僧裸形，手持一杖，束白绢，进退为步，在安南罗城南面。本使蔡袭，当时以弓飞箭当胸，中此胡僧，众卑归贼营”。胡僧所施展的法术为密教的特征，此外，在《南诏野史》中，还有保和十六年（公元840年）梵僧赞陀崛多到大理传播佛教，后被南诏王劝丰祐封为国师。当然，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剑川石钟山第二号窟“阁罗凤议政图”。窟高1.46米，宽1.52米，成坐宫议政的状，全窟共雕了十六人，南诏王阁罗凤坐在龙椅上，背后刻有五个武士，每人手执旗，又有二个武士执扇，古时称为“翼”，有一执“铎鞘”的羽仪长及二侍从，两侧各雕有身着唐服的清平官（相当于唐宰相）。王者的右侧坐着一个和尚，他手捻佛珠，头上撑着曲柄伞（吐蕃称为红繖）。这位身势显赫的和尚，据《南诏野史》记载：阁罗凤归吐蕃“遣弟阁陂和尚及子铎传、酋望赵佺、邓杨、傅侯等並子弟六十人，献凯吐蕃。陂有神术，人马往来吐蕃，不过朝夕之顷。”“曲柄伞”、“兼有神术”都与密宗有关，可以说阁陂和尚是一个典型的密教僧人。石窟的开凿年代为南诏、大理国时期，沙登箐一号窟有“国王天启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的题记，“天启”为南诏王丰祐的年号，天启十一年为唐大中四年，即公元850年。剑川石钟山石窟第六号窟有八大明王造像，俗称“石将军”，中为多闻天王，高5米，一手持杵，一手托塔，旁有两力士

侍立。从石钟山石窟的造像都可看出其密宗浓厚的色彩。

作为佛教派别之一的密宗，它是打着佛教的名望的古印度文化，用苦行与解说并存的修行方法以达到精神理想与官能控制，并渗入咒语、魔术，在五大神魔与母姓神的祭礼中，用“三密”与师尊相溶而完成圆满的身证，即解脱成佛不必象禅宗那样累世修行，苦读大易往籍，而只需要多念咒语，就可以消除痛苦，即生成佛。密宗尊奉的最高神是大日如来，即毘卢遮那佛，为其护身佛。此外，密宗还有它尊奉多神偶像，除称为“诸法之相”的大日如来外，其他神祇，千奇百怪，不可名状，诸如多臂三眼的十一面观音，观音变像就有数十种之多。护法神祇就有北方多闻天王、金刚、马头明王、大黑天神、吉祥天女。佛教原来是禁欲主义者，有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四根本戒，则密宗却把女性作为修习密法不可缺少的条件，叫做“双修”，一反禁欲主义，使宗教更加世俗化了。李京在《云南志略》中谈到大理地区佛教时说：“佛教甚盛，戒律精严者，名得道，俗甚重之，名师儒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段氏而上，选官置吏，皆云此。”密教，在大理地区，称为“阿叱力教”，意为“师尊”。师僧有妻室儿女，其宗教职业可以世代相承。大理市凤仪区北汤天村有法藏寺，又名“金盂宝刹”，建于明永乐年间，寺内现存《董氏本音略叙》，虽为清光绪十八年所撰，但记述董姓一族的族谱非常详细，“始祖先胎伽罗尤系出于大唐……复至生处得经书法宝，一目了然，通秘密关精。”董晋明辅佐段思平灭杨干贞，建立大理国。二十四祖董贤“敕封伏魔卫正神通五密大我国师”。“令子董崇世袭大理阿叱力都纲司职，董茂世袭赵州（今凤仪）法官”，碑文具有浓厚的密宗色彩，也是密教在大理地区传播的佐证。其他具有密宗特点的文物，在云南洱海及滇池地区比比皆是，现列举如下：

一、崇圣寺 据《徐霞客游记》记载：“寺在第十峰之下，唐开元中建，名崇圣寺，前三塔鼎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十阶层，故今名为三塔，塔四旁皆高松苍夭，其面由山门而入，有钟楼与三塔对峙，……楼中有钟其声闻可八十里，楼后为正殿，其后为雨铜观音殿。”又据《南诏野史丰祐传》记载：“开成元年，王嵯颠建大理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高三十丈，自保和十年至天启元年功始完，匠人恭韬、徽义、徐立”。

在崇圣寺内，重要文物之一为铜钟，据《徐霞客游记》载：“铜钟极大，径可丈余，而厚及尺”。王昶《金石萃编》杜钧跋尾云：“铜钟高丈余，在大理府崇圣寺前楼，钟铸作两层，上层镌金刚、智宝、大轮、妙法、胜业、慧响波罗密；下层镌增长、大梵、广目、多闻天王、天主帝释、持国天王像未铸建极十二年（871年）建”。造像的右上方均有梵文，造像为密宗的崇拜物及神祇。

二、细腰跣足观音。像高丈六，传说铸时，下降雨铜，造成铸像，俗称“雨铜观音”。据胡蔚《南诏野史·舜化贞传》曰：“光化庚申三年（公元900年）铸崇圣寺丈六观音，清平官郑买嗣合十六国铜所铸，蜀人李嘉亭成像”。

三、千寻塔出土的文物

1、杨氏铭文铜像。高一尺五寸，系一九四二年被德国传教士鲍格兰所盗，一九四九年冬被我方缴获，现藏云南省博物馆内。铜像背后有“追为坦绰杨和丰追称宣德大王”十三字的铭文。

2、段氏铭文铜像。（美）海兰茄频在《云南观音像》中叙述：此像高约一尺五寸，背有铭文“皇帝曠信段政兴资为太子段易长生，段易长兴等造记，愿禄算尘沙为喻，保庆千春，孙嗣天地标枝，相承万世”。这是国王段政兴，祷祝神灵保佑其子孙万世享受福禄无穷。

3、一九七八年在维修大理崇圣寺千寻塔时，在塔刹基座内出土唐、宋时期文物671件，其中佛、菩萨像、天王力士及其他造像123尊，其中有观音及三头六臂的明王等密宗造像；有密宗法器之一金刚降魔杵213件；《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自心印陀罗尼法咒语》、《曼荼罗图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密宗经咒梵文印咒等。这些文物均可看出在宋大理国时期密教在云南的兴盛情况。

四、《南诏图传》为南诏王舜化贞中兴二年（公元898年）所绘制的以佛教题材为内容的长画。画分为图画和文字两个长卷。图画为纸本彩绘，长19.15尺，高1.04尺；后为文字，详细说明画卷上的故事情节以及王奉宗、张顺二人奉诏绘制的经过。画的末尾，有记云：“仅按巍山起因、铁柱西洱河等记，并国史上所记载的图书、圣教初入邦国之源，谨画图样，并载所闻，具列如左，臣奉宗等仅奏，中兴二年三月十四日”。按记内所称“巍山起因”，

即梵僧感化南诏王细奴罗等画，为《白国因由》观音授记第九所记载的内容。梵僧（观音）戴赤莲冠，其冠九重，黑白相间，而花瓣作方形，重迭而上，类似莲蕊之状。此画中的梵僧（观音）造像以及其所施展的法术都具有密宗的色彩。

五、大理国张胜温画卷 正名《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此卷高30.4公分，长1636.5公分，共134开，有像628个，全卷可分三段。前段题为“利贞皇帝禀信画”，画国王、王妃以及侍从等像，长72.2公分；中段画诸佛、菩萨、天龙八部法会等像，长1515.2公分；第三段画天竺十六国王，长49.1公分。利贞皇帝就是大理国王段智兴。绘画完成的时间约在1173~1176年之间。清乾隆皇帝十分喜爱这个画卷，就命丁观鹏在章嘉活佛的指导下，把卷中的佛、菩萨、罗汉、龙王等重新排列临摹为一册，名曰《法界源流图卷》，而把与国王有关的部分复绘为《蛮王礼佛图卷》。原画现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法界源流图卷》藏吉林省博物馆，卷高33厘米，长达2014厘米，比原卷略高，长四分之一。《张胜温梵像》的内容十分庞杂，可以说包罗万象，是大理国时期佛教重要的史料宝库，其中大部份为密宗造像，诸如毘卢遮那佛、十一面观音、大黑天神、天王力士像，其他还有金刚降魔杵，法铃梵文宝幢等。它告诉我们：南诏晚期至大理国时，云南是盛行密宗的。罗膺中《张胜温梵画譬论》中：“卷中左幅列种种观音变像，盖以五密诸尊，盖表大理特有之佛教也……密宗之入大理，始与西藏松赞干布之遗屯弥三补扎苗学五印大宏佛法同时一本卷密教诸尊名目与西藏同。

六、《护国司南抄》（残卷）及其他写经。一九五六年八月在大理凤仪北场天金宝刹大殿中发现一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写经，其中南诏晚期的写经《护国司南抄》五卷，在卷一而附“校勘录”中提到“时安国圣治六载甲寅岁末夏之季日”的记年，据考证为隆舜时期（公元894年）的写本。是根据唐代翻译家不空、良贲的《仁王护国经疏》再加疏解而成书，把南诏密宗和中原密宗祖师挂上了。写本卷首下署：“内供奉僧崇圣寺主密宗教主、赐紫沙门玄鉴集”，这说明南诏已经信奉密教，崇圣寺住持为“密宗教主”；崇圣寺是当时规模宏大的密宗寺院。

七、洛阳山石雕 在安宁洛阳山，有卧佛、罗汉等造像，为大

理国时期的石刻。卧佛长12尺，横卧于寺南岩龕内，作曲肱而枕半睡状，袒胸跣足，神态奕然。十六罗汉在东面石壁上，排列为上中下三层；此外，还有梵文石刻。据景泰《云南志》卷一载：“洛阳山在安宁州东十里，殷氏于东山石壁凿十六罗汉其上”。据释典，罗汉，即阿罗汉，分住四方，护持正法度无量众生。后罗汉多为十人，因此，安宁洛阳山有二罗汉飞去之说。但实则早期造像。

八、法华寺石窟 在安宁城东约5公里，寺早毁，尚存佛、菩萨、罗汉像，其中有一卧佛，长约4米，头戴花冠，一手枕头，一手扶膝，侧身而卧。

九、晋宁摩岩石刻 在晋宁县西南约五公里处，有一巨岩上镌刻多闻天王像一尊，当地称为“石将军”。造像高六米，右手持三尖叉，左手腰扶，右脚踏一虎，左侧地面一塔，像旁有“大圣毗沙门天王”字样。据《法华经》义疏，此天王守护在“毘沙门天”，保卫如来道场，多闻佛法，故名，又因此天位王位于北方，故又称“北方天王”。

十、地藏寺经幢 在昆明古幢公园内，通体石制，呈八角形，高8.3米，分七层，共雕像292尊，上五层造佛像，第六层四天王立像，左右空处刻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咒》；第七层分八面上刻《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大日尊愿发四弘誓愿》及《造幢记》。其下为须弥座上刻天龙八条，造像精美。记《造幢记》载：“大理国佛弟子仪事布燮袁亘光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陀罗尼”为梵语意为“总持”。密宗认为唸《陀罗尼经》可解除一切罪恶和痛苦，即生成佛。

十一、金刚塔 在昆明市官渡区螺峰村街上，这里原有妙湛寺，故名妙湛寺塔，为五塔组成，中塔通高16米，塔座方形折角须弥式，边长5.5米，四角各雕力士像一尊，两侧为金刚界五部之佛座，东狮，南象，西孔雀，北迦楼罗，塔刹由宝座、塔肚、摩尼珠和宝瓶等组成，实为一小型喇嘛塔。四小塔形制一致，分立四角。金刚塔造型古朴典雅，庄严雄伟，它既表现了佛教密宗的内容，也保留着早期喇嘛塔的特点。塔建于明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金刚塔属于金刚宝座式类型，它的形制和雕刻表现了密宗金刚界五部的内容，为密宗的典型塔式。

十二、官渡土主庙 位于昆明市官渡区螺峰村西，始建于南诏

时期，现存大殿为清末重修。大殿内原供奉大黑天神塑像。大黑天神，原是印度森林中的战神，后来成了密宗的护法神，而在云南则成了违抗玉皇旨意的叛逆神，其像凶恶，青面獠牙，三头六臂，身背骷髅，俗称“伽兰”。

十三、保山卧佛寺 在保山市西北二十余里的卧佛山上。《南诏野史·丰祐传》记载：“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僧梦岛造永昌卧佛长丈六”。又《滇释记》云：“梦岛法师侍李贤者至大理，贤者寂，师返永昌开龙泉寺”。可知此卧佛为南诏晚期的密宗造像。

十四、大姚白塔 座落在大姚县城西文笔峰顶，又名磬锤塔。塔高十八米，上大下小成椭圆状，因表面涂有石灰砂浆，故名白塔。据大姚县志记载：“白塔砖有字曰‘唐尉迟敬德监造，与昆明东、西寺塔字同’。塔砖上有印模印出汉、梵文字。汉字有‘大佛顶’，‘八大灵塔咒’、‘阿众佛灭正报咒’等，其中‘阿众佛灭正报咒’与大理弘圣寺塔的塔砖相同，这为唐代晚期的建筑，是我省现存的唯一藏塔，也是密教在云南传播的佐证。

十五、博什瓦黑石刻画像 位于四川昭觉县长湾区，博什瓦黑彝语意为蛇门岩，在巨大的岩石上刻有释迦牟尼、观音、四大天王、明王、南诏王及侍从像，这些都是密宗造像。

以上这些文物是密教唐初由印度传至西藏，在南诏时再由西藏传到洱海地区，崇圣寺佛顶寺就是当时最大的密宗寺院，就其范围来看，是以洱海为中心向西到保山，向南则到大姚、西昌；向东则至滇池地区。其传播时间始于唐中晚期，盛宗大理国时期，直至明以后，禅宗才在云南盛行，密宗才逐渐衰微，但至今在民间也还在流传。

照 片 附 后：

- 1、剑川石钟山石窟第2号窟——阁罗凤议政图。
- 2、剑川石钟山石窟第10号窟——梵僧像。
- 3、剑川石钟山石窟第10号窟题记。
- 4、大理崇圣寺三塔。
- 5、崇圣寺三塔的铜钟上密宗造像。
- 6、崇圣寺细腰跏趺观音。
- 7、崇圣寺三塔千寻塔出土密宗造像及法器。

- 8、《南诏图传》梵僧（观音化身）造像。
- 9、《张胜温画梵像》毘卢遮那佛、释迦牟尼光佛会、十一面观音、大黑天神、摩诃罗刹造像及梵文宝幢。
- 10、昆明地藏寺经幢全景、天王力士像。
- 11、官渡妙湛寺塔。
- 12、大姚白塔。
- 13、大理弘圣寺塔出土塔模。
- 14、昭觉佛什瓦黑摩岩石刻南诏王（蒙世隆）出巡图、八大明王造像。
- 15、洱源旧州本主庙——观音老爹造像。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管所 张楠

南诏蒙舍城遗址调查记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是南诏发祥地，古时称蒙舍川。自唐代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细奴罗灭张乐进求而自立起，至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迁都太和城止，近九十年时间，都以蒙舍川为活动基地。

南诏早期历史，文献记载甚略，有待于文物考古发现。据有关文献记载，南诏早期曾在蒙舍川建城二处，即巍山图城和蒙舍城，巍山图城遗址云南省博物馆曾发掘过（1），唯蒙舍城遗址尚少有人知，笔者曾对蒙舍城遗址作过考古调查，又经过实测，现将调查情况简报于下：

古城遗址在庙街区古城村，南距巍山县城七公里，北离传说为细奴罗盟石的地方庙街二公里，西至古城村百余米，东距关隘公路二百米。

由城建于东山向西河（即古阳瓜江）倾斜的缓坡上，南城外为河流（2）。城内外及城壕土埂都已开为田地，但四至尚可辨认，以东、南、西三面保存较好，仅为一些断断续续突起地面的土埂或土堆。北城及东北角已为平地，南城壕为一东西向的水沟由中心贯通。

=8=

城埧夯土筑成，夯层厚9至12分米，夯筑紧密坚实。城作方形，方向北偏西15度（以东城为准）。城内地面作斜坡形，东高西低，高差2.5米。城埧残高0.5至4米不等，残厚约4米。南北长167.5米，东西宽162.5米，周长660米，面积26218平方米。

城南以河流为天然屏障，西、北二面，充分利用斜坡特点，将斜坡削直再加高为城埧，故北城埧已与城内田埂一样平，却高于城外数十分米至二米余不等，西城埧仅高于城内地面五、六十分米，高于城外却有四米之多。

城门遗址不明，在南城中却有一缺口，正对城内土台，由此缺口下河取水最近，城门似应开设于此，因此城甚小，不必四面开城门。

由于数百年来在城中耕种，地面遗物仅一土台和残丘。土台位于北城埧中点前面，残破不整，约略作方形，长宽各近20米，高0.7米至2米不等，台上碎瓦堆集最多，应为一建筑物遗址。此外南城埧上水沟中亦多碎瓦，城内田边及水沟内，仅有零星碎瓦。

瓦有筒瓦、板瓦及瓦当三种，形制厚大，背有麻布纹，色青或灰或黄灰色，泥质细，火候高，其中有字者极少，仅拣到七片，内六片背有模印阳文反书“官”字，另一片上下已无，中间存模印阳文正书“方广用”三字。瓦当为八瓣或十一瓣莲花纹，四周有乳钉纹。以上所述，都和岷岷图山南诏遗址相同，唯另有一种兽面纹瓦当不见于岷岷山遗址。此外，城内尚拣到明代青花瓷盘及火葬罐碎片，过去在农田耕作中，常有此类火葬罐发现。

古城南临河流，建于斜坡上，以斜坡削直再夯土加高而成城埧，建筑物有土台基，出土有字瓦和莲花纹瓦当，这些正是南诏时代文物的特点。据康熙蒙化府志载：“蒙舍城在郡北十五里古城村，张氏让国，蒙诏筑土城以居，今中已成田，旧壁屹然如故焉。”唐书地理志“白崖城又七十里至蒙舍城，自蒙舍城八十里至龙尾城”。古城位置与上述方位同，故庙街区古城村古城，应为南诏时期蒙舍城遗址。

南诏岷岷图城和蒙舍城建筑年代，诸书说法不一，或云“张氏让国，蒙诏筑（蒙舍）土城以居”。或记“至乐进求为蒙氏所灭，蒙氏名细奴罗，城蒙舍之龙圩图而都之”。（3）按云南志载“蒙

舍北有蒙窝诏，即阳瓜州也，同在一川”。今崧山坝子南北不过长四十公里，蒙窝势力强大，同在一川，在坝子内建城无险可守，极不安全，而峨岷图城建于山上，前有阳瓜江，背有大山，易守难攻，蒙舍城则弹丸之地，处于平川，不足以守，故峨岷图城建造年代应在先，而蒙舍城之建立，应在灭蒙窝诏之后，蒙舍川悉为其所有，方能建城，其时代应在皮罗阁时期。

南诏迁都太和城以后，重心北移，然而，唐代于蒙舍川置阳瓜州，授阁罗凤及凤迦异为州刺史，又蒙舍为南诏首府地区六賧之一，大理时于此设置开南县，以上治所不知在何城，肇域志蒙化府条“永泰初改蒙舍城为阳瓜州”。可知阳瓜州治所曾一度置于蒙舍城，又元史地理志“蒙化州本蒙舍城”。故蒙舍城一直沿用到元代。当然，蒙舍城甚小，只能作为一军事据点或作统治阶级居住地，这在南诏时期，许多城镇都是如此的。到了明洪武二十三年，筑蒙化城于今崧山城区，蒙舍从此就荒废了，古城内出土明代火葬罐，即为此一历史的证明。

注 释：〔1〕考古1959年3期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崧山峨岷山南诏遗址的发掘”

〔2〕据当地人讲，今南庄塘河原流经古城南门外，后河流改道，故南城外田表土下为河卵石及沙。细查东山，山有谷口正对古城南城外，古时应有河流由东向西下流，又顾旗厂三元宫内有乾隆52年所立之顾旗厂上半甲功德碑记，上记“姚家坡田一分，东至城河塘”。由此可见城南原有河流。

〔3〕元·李京，云南志略，云南总叙，见云南史料丛刊十辑

巍山县文化馆 陈维昆

洱海名称由来与历代演变释

洱海，这滇西北高原上的湖泊，不论在地理上及历史上，确有它重要的地位。在祖国南疆自有人类以来，这湖泊哺育周围活动民族的光辉灿烂历史文化。古代这湖泊名称记在史书上，应是西汉时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这传中的“……西自桐师以东，北至牂榆，名为牂昆明。”到六朝的南朝刘宋人裴骃《史记集解》中，对“牂榆”这名词，引三国东吴人韦昭说“益州县，牂音叶。”（韦昭这说是牂榆乃益州的一个属县，笔者注）。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中，对“牂榆”这地名词说“上音叶，牂泽在靡北百余里，汉牂榆县在泽西益都。靡北，本牂榆属国也。”司马迁的记载与韦昭、裴骃的注释是没涉及到叶榆泽，唐人张守节才指出“牂榆县在泽西”。虽在《史记》中没搜叶榆泽，但在班固《汉书·地理志》的益州郡条，记着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开设益州郡，郡的属县二十四，有“叶榆（县），叶榆泽在东。”以此可断，古代祖国南疆叶榆泽这湖泊名，在司马迁时代或其前已有了。

晋人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后人把它收入范曄《后汉书》。笔者注）的永昌郡条，在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由西汉的益州分置永昌郡，郡属八城（即八县，笔者注），中有“牂榆”这地名的记载。六朝梁人刘昭注《郡国志》，对“牂榆”这名称，引晋人崔豹《古今注》说“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治牂唐，镇尉哀牢人牂榆蛮夷。”刘昭注又说“有河”（即指叶榆泽，笔者注），又引《地道记》所載“有泽，在县东。”刘昭注说的“河”与“泽”殆即班固《汉书》的叶榆泽了。

晋人陈寿《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载：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后，分前永昌郡而置云南郡，但陈寿的书中没记及牂榆县与叶榆泽这些地名称。到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牂唐，侯王国以十数。”又云南县条说“叶榆县，有河州”顷看“州”或为“川”之讹。汉字的“川”、“泽”古时每连贯的用词，常璩的“河川（州）”应是泽之用，如蔡邕《月令章句》的“众流注海曰川”。北魏酈道元《水经注》中，对叶榆泽（河）多提及，是多采前人之

说，属误较多，终归杂乱，然听说“叶榆泽，叶榆水所钟，而为此川藪也。”这“川藪也”说的可不差，检《尔雅·释地》“十藪，大泽也。”以此来断《华阳国志》的“叶榆县，有河州。”的“州”实应是“川”之误。又古代中原人士著录这南疆湖泊的名，绝大多数不亲临其境，故对这不大不小的水渚在概念上可说模糊，才导致在古代文献上对这湖泊有泽、河、川等的记称。稽自汉代到拓拔魏这五六百年的阶段，史籍上对南疆的楸（叶）榆县，叶榆泽无专门篇章而较详备的著述，但零星的记载则为数可不乏。然对这地名称的由来，其意云何，是没见到有人作过阐述。今我们可肯定的说：古文献中“叶榆”这地名词它是古代地方民族语词的汉字记音。从表面上看这名词是十足的汉语名词，如“县”是秦、汉时地方行政单位名词；“泽”是古汉语湖泊之称。观《国语·周语》“泽，水之钟也。”司马相如《上林赋》的“云梦泽”（古代中原地区的大湖泊，已涸。笔者注）。以此断古代文献中对南疆的叶榆县，叶榆泽的“县”与“泽”这词语，它纯属汉化可无疑，但“叶（楸）榆”这字词，应是以汉字记录的民族语音。古今中外，语言和文字，是属人类社会交际的工具，尤其是语言，它是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任何民族的语言，有的是消失，有的被保存，有的是新产生。新产生的语词，了解它的原委是容易。对于古代语，尤其是以汉字记录的古代民族语，那就很不容易了。我国历来是汉字通行，然汉字的特点不单是一字一音的单音字，更是有为数不少的是同形异音或异形同音与近音字，前人已意识到，以汉字著录其他民族语或各地方音，有“译语对音，本无定字”之感。在文献中为数不少的古语词，姑无论属哪个民族的，在历史进程中，很多是字形音已变化，若认定当前的情况来判定，那怎么也得不到原委。

在文献中，洱海之名，自西汉到六朝是称“楸榆泽”，“楸”有的作“叶”，汉人称“泽”，晋与六朝作“河”、“川（州）”或水。隋、唐是称“西二河”或“西洱河”。又西洱河的“洱”，后又演变为“耳”或“珥”。在这里且别讲这名词是汉代用汉字记录的民族语音，就判定它纯是汉语词，并硬性的说隋、唐时的“西二河”及“西洱河”这名词，是汉代“楸（叶）榆泽”这词的演变，这就是风马牛了。

要认识洱海在汉代的名称是牒(叶)榆的由来与其云何,切不能单在“牒(叶)榆”这字与语意上胶柱鼓瑟。在《史记·司马相如传》载“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司马贞《史记索隐》对“斯榆”注说“斯,郑氏音曳。张揖云:斯榆,国也。”又《司马相如传·告蜀父老书》有“略斯榆”,《索隐》注说“服虔云,夷种也。”对“斯榆”这名词,《索隐》注说是“国”,“夷种”可说不误。已故的云大教授方国瑜先生,所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卷一,丁《辞章及杂载之属》的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文句“斯榆”这词注说即“叶榆”,可惜方先生没作深入阐明理由。今云大副教授尤中先生对“斯榆”这词也注意到,在他的《云南民族史》上册,第二章《秦汉时期的西南夷》,第一节《族系部族的分布》的苞满条,以《史记·司马相如传》的“略斯榆,举苞满。”尤先生释云“斯榆乃僂(音髓)的长音,急读为僂。略斯榆,即略定滇西僂、昆明地区。”尤先生的见地是比之方先生的说法是较进一步,说来方、尤两位先生各虽说云其然而仍没得其所以然。依二位先生说法为启示,检《华阳国志·蜀志》记述三国时川滇边境民族情况和称谓,也可以之观两汉到三国,这地方民族名称基本上还相似,观《蜀志》越僂郡条载的蜀后主延熙二年(公元239年),越僂郡有“四部斯儿”、“斯儿督”。邛都县条载“又有四部斯儿”。再查《史记·司马相如传》的“斯榆”这词语,《索隐》中对之注说“斯读如字,益部耆旧传谓之斯夷,华阳国志,邛都县有四部斯夷一也。”清人廖寅校勘《华阳国志》,勘定“兒(儿)”为“夷”,顾广圻校勘是说《史记索隐》的“夷”为不误(参看商务印书馆国学丛书《华阳国志》,笔者注)。看来“夷”与“儿(兒)”是谐音,观《淮南子·汜论训》有“夷儿”的人名可证。总之“斯儿”、“斯夷”即汉代的“斯榆”,也即是尤中先生指出的“斯榆,乃僂(髓)的长音,急读为僂。”观《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牒榆的“牒”,《汉书·地理志》是作“叶”,《后汉书·郡国志》是作“牒”,不管怎样,它是字形稍不同的同音义是无疑问,然它的本音是读“摄”,《论语》“叶公问政”的“叶”本音是“摄”,刘向《新序·杂事》“叶公好龙”的“叶”本音也是“摄”,又宋人郑樵《通志·氏族略》“叶氏,旧音摄。”据此等而断,《史记》,《汉书》中的“牒榆”与“叶榆”的“牒”与

“叶”其本音确是“摄”。清代音韵学家陈奂《毛诗传疏》“叶从紫声，紫从世声，故叶、世同训。”这也是“叶(櫟)”的本音是“摄”的一证据。到此堪可以说《史记》里的“櫟榆”即是《汉书》里的“叶榆”，而这櫟(叶)榆，也即是《司马相如传》的“斯榆”。并“櫟(叶)榆”，“斯榆”是“僇”，这是由单音词演为复音词。在《史记·西南夷列传》的“北至櫟榆、名僇、昆明。”的措词得要一了解，这“櫟榆”跟“僇”是否有点模糊。观王国维《观堂集林·太史公行年考》：司马迁云使西南是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110年)，汉王朝设置益州櫟榆县，据《汉书·地理志》是元丰二年。《行年考》断“史公作记，创始于太初中。”那他写《西南夷列传》是在汉王朝置櫟榆县之后。他是遵从王朝的定名，才分别标云“櫟榆”、“僇”。后的《汉书·地理志》中，著录“叶榆县”及“叶榆泽”，会是参考王朝档册与史公的书，即以这地区僇(櫟榆或斯榆)族之名为县与泽之名，这应是理所当然。因汉字的特点是单音字和单词，又多字形相异而同音或近音，始终免不了“译语对音，本无定字。”在汉代把“僇”作“斯榆”、“叶(摄音)榆”，丝毫不为离奇古怪。再要解决一下文献中滇池与昆明池是一或是二的问题：这一事，目今还在争议，观《汉书·地理志》的滇池与叶榆泽分明是二，《史记·平准书》载“(元狩三年)作昆明池”，《索隐》说“案，黄图(即《三辅黄图》，笔者注)，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习水战。荀悦云：昆明子居滇河中，故习水战以伐之也。”《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三年)发谿吏穿昆明池”。唐颜师古注此条，引臣瓚(人名，六朝人，笔者注)曰“西南夷有越僇、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汉遣使求身毒国，而为昆明所闭，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习水战。”又《汉书·杨雄传》载“穿昆明池，象滇河。”上面诸条是以昆明池即滇池。看来这应是史家不慎察而导致混淆不清，不然就是历代传抄而致误。昆明池应是叶榆泽的别名，泽(池)因僇(叶榆，斯榆)与昆明而得名，叶(摄)榆、斯榆(僇)是汉代以泽周围族称而名为叶榆县，水(泽)亦从县名。泽旁也有昆明族，也以族名名水，故昆明池是其别名，因叶榆(僇)较通行，昆明这名少为人用，明乎此，那昆明池实是叶榆泽而确不是滇池。

到隋及唐之前期，洱海的当时名称，在字的形、音、义上，